

陈鼓应著作集

尼采新论

陈鼓应 著

中华书局

| 陈 | 鼓 | 应 | 著 | 作 | 集 |

尼采新论

陈鼓应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尼采新论/陈鼓应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5.10

(陈鼓应著作集)

ISBN 978-7-101-11077-7

I.尼… II.陈… III.尼采,F.W.(1844~1900)—哲学思想—文集 IV.B51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56990号

-
- 书 名 尼采新论
著 者 陈鼓应
丛 书 名 陈鼓应著作集
责任编辑 邹 旭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10月北京第1版
2015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920×1250毫米 1/32
印张9 插页2 字数192千字
印 数 1-4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1077-7
定 价 39.00元
-

《陈鼓应著作集》总序

一

我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校园中度过，这期间，两岸历经对立与交流的种种曲折。我的现实人生与学术人生亦颇多波折，两者交互抵触，有时又能相互彰显——现实人生的坎坷，常使学术路途中断，但我“困”而知之，不断激发求知的动能，进而丰富着我的学术人生。

我的著述主要分两类：一是学术专著，二是时感性的文章。后者将以《鼓应文存》为名，另外编成一个系列，包括《失落的自我》、《言论广场》、《台大哲学系事件》、《走进白色恐怖》、《台湾民主运动脚步》等著作。这一系列反映着我所处的境遇与时代的路痕。

我的专业著作，主要集中在道家各派及三玄四典的研究。《悲剧哲学家尼采》是我的第一本书，这本小书奠定了我学术的

基础,接着是《庄子浅说》,用力较深的则是费时多年的《庄子今注今译》。可以说,从尼采到庄子,是我学术路程的一条主线。借着他们,我将现实关怀与学术人生联系在一起。

二

大学期间,受先师方东美中国哲学史课程的影响,我体会到,如果不能了解一个民族的灾难,也就不能理解这个民族文化的深层底蕴。个体生命也是如此,正如叔本华所说:“一定的忧愁、痛苦或烦恼,对每个人都是时时必需的。一艘船如果没有压舱物,便不会稳定,不能朝着目的地一直前进。”我的现实人生与学术人生就是在这样矛盾的状态下并行演进着,恰恰体现了老子祸福相依的哲理。

中青年期间,我常处于逆境中,尼采的冲创意志和庄子在“困苦”中保持定力与超越的心境,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激励着我迎难而上,永葆生命的昂扬气概。

台湾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历了白色恐怖,我在这一时期的学术著作反映了我内心对于自由民主的渴望。到了七八十年代,我在文献和学术论著方面打下基础。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那段时空中,我虽然经受着现实环境的冲击,却还能积极地参与学术、文化上的反思。透过古籍文献的整理与诠释,我不仅得到传统人文思想的熏陶,还表达了对极端化与绝对化的神权思想的反感,阐发了对威权体制下的人身崇拜和造神运动的批判。这一时期,我以尼采和庄子为主的论著,都反映了“任其性命之情”的倾向。接下来,《道家的人文精神》和《庄子的人性论》两书的内

容,又可以说是“安其性命之情”的展现。

三

《陈鼓应著作集》共二十本,它们分别在海峡两岸不同的时空中写成。有关尼采哲学和存在主义的介绍以及老、庄的注译,都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台大校园里完成的。1973年春夏,因为参与台大校园内的保钓运动、发表时论,我和王晓波在“台大哲学系”事件中首遭整肃。自此以后,我的学术人生被迫中断十余年,直到1984年才在北京大学重启学术生涯。

在北大哲学系执教期间,我除了陆续完成道家各派典籍的诠释,也针对当时大陆学界的研究现状,着力于围绕以下三个议题表达不同的观点,并在《哲学研究》等刊物上陆续发表相关论作:第一是中国哲学开端的议题;第二是《易传》的学派归属问题;第三是理学开山祖的问题。这三个重要的议题构成了我的《道家哲学主干说》的中心议题,这将是我的最后一本学术专著。

“9·11事件”之后,整个世界更加动荡不安,就像司马迁所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也像泰戈尔《演讲集》中对西方思维方式的描述:“西方人习惯于按照人们所归属的半球不同,而将人类世界断然划分为好的和坏的。这种傲慢的分裂精神严重地伤害了我们,给我国自己的文化世界造成巨大危害。”事实上,战争与冲突的根源多在于东西方文化上的差异。为此,我更愿意站在地球村的视角思考问题。中国哲学儒、墨、道、法各家,传承数千年而蕴涵着中国文化的内涵,各有其普世的价值。这种普世价值,是指在人文精神的照耀下,老、孔、墨、庄的思想都散发出普世

的情怀,即老子的贵柔及其宽容心态、孔子的恕道及其家庭伦理、墨子的兼爱与非攻思想、庄子的艺术人生和齐物精神。

四

我们这一代都在内忧外患中度过重重的困境,我生长在动荡时代的福建客家山区。从我有记忆开始,日本军机就在我的家乡频繁轰炸,导致平民死伤无数,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

由于长时期目击了强权带给人类灾难的战争,逃难、流离、思乡之情始终扰动在我的生命中。然而,尼采的酒神精神、日神精神和《庄子》的“任其性命之情”、“安其性命之情”的洒脱心境,却赋予了我困境中思索与写作的动力,使我能够在尼采的思想中,寻找到精神的家园,在《庄子》的天地中,寻找到心灵的故乡。

五

台大校园和北大校园是我这一生学术活动的中心点。我从台大哲学系退休之后,晚年又重返北大哲学系任教,有赖于北大哲学系主任王博教授的邀约和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鹏程瀚宇公司孙宝良总经理帮我安顿入住到北大中关村新园寓所,使我有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可以安心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这一套著作集系列的筹划和出版,是由北京中华书局顾青总编辑积极促成的。对于上述诸位的雅情高谊,我在此一并致谢。

最后,我要说明的是:除了少数的几部书稿,著作集中的大部分书稿都曾在两岸出版过,此次汇编再版,都以最新或经过修订

的本子作底本排版；除了少数几部新作外，凡旧稿中的前言或序言皆一仍其旧，予以保留，不再另行撰写。

陈鼓应

2015年4月21日

于北京大学道家研究中心，时年八十

序一 生命的驱动力

——“冲创意志”的理解

(200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版序)

有关尼采的论述,我前后写了两本书。第一本书是1963年自费印刷、1966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印行的《悲剧哲学家尼采》,而本书是我在台大和北大两地任教时陆续撰写而汇编成册的。各文写作的时地虽有不同,但所表达的学术观点和个人心声却有其一致性。

在我早先研究尼采的时期,国内外学人的著作中,提及尼采总是发出不应有的错误讯息。因此,我在写作时,力求对文本给予合于原义的解释,一并对曲解误说作出澄清。不过我运思时字里行间总不免流露出自己对时代的感受,并抒发个人的切身体会。无论尼采或庄子,对我来说,都是感同身受的一种生命的学问。

我算不上尼采专家,但对尼采重要学说的理解,自始便能给

读者提供一个较为确当的解说,兹举“超人”的学说与“冲创意志”的概念为例,相信较能简明地把握尼采的原义。

在尼采代表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序言中首次提出超人的主张,关于“超人”的内涵包括有这两个重要的面相:其一说,“超人是大地(earth)的意义(the meaning of the earth)”;其二说,“人是要超越自身的某种东西”。前者是就世界观而言,为尼采否定西方传统二元论世界观,肯定大地(人间世)为唯一的实在世界;后者是就人的意志力的发挥而言,尼采认为每个存在体都具有巨大的“冲创意志”,他呼吁人们要不断地发挥自己的潜能、潜力去提升自我。尼采将这种内在于个别生命体的驱动力,称为“Der Wille zur Macht”,英译为“The Will to Power”,我们学界皆译为“权力意志”,这是极其严重的误译。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就说过,这种意志是“创造生命的意志”,因而我在第一本书中就提出“冲创意志”之译名。

尼采使用“冲创意志”,以解释人类的行为乃至宇宙间的一切现象。在我44年前写《悲剧哲学家尼采》时,就对“冲创意志”之作为“原始的动机力”征引原文加以说明,并指出作为尼采哲学推动力的这种意志,“储藏于内时,是为潜能(或潜力);表现于外时,是为动能(或动力)”。收入本书的文章《尼采的价值转换》中,我再度强调:“冲创意志是在文化上的狄奥尼索斯原理以及在自然中的生机原理(the Vital Principle)。它是一个心理学上的概念。离开升华作用,便无法了解尼采这个概念。它是一种提升力,它被升华而为创造力。”可见译为“强力意志”也不妥,因为“强力”一词,则易忽视它之作为心理现象的驱动力。至于长久

以来,学界习以“权力意志”解释尼采这一最基本的重要学说,那就误导过深了。

在本书《尼采哲学的价值重估》文中,我对“冲创意志”的概念,作了较详尽的论述,同时对尼采“永恒重现”的学说,也作了比以前更清楚的解说。《价值重估》对尼采重要学说作了一个总结式的论述,它是最费心思写出的一篇论文。

《尼采哲学与庄子哲学的比较研究》刊出之后,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郜元宝编的《尼采在中国》选录了此文“结语”部分;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教授格拉姆·帕克斯(Graham Parkes)编著的《尼采与亚洲思想》(*Nietzsche and Asian Thought*, 1991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收入了全文(由James Sellman英译);韩国编著了一册《尼采》(全书共603页),我这篇文章由光州全南大学中文系吴万钟译成韩文。

拙著《悲剧哲学家尼采》和《尼采新论》得以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有劳编辑孙瑜先生和我保持密切的联系,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2006年3月写于台北市舟山路台湾大学宿舍寓所

序二 研究尼采的心路历程

(1987年北京三联书店版序)

一

鲁迅曾称尼采、歌德、马克思为伟大人物(《致〈近代美术思潮论〉的读者诸君》)。尼采的作品在中国文坛曾有不小的影响,他的思想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是颇多启发的。

尼采死于1900年,梁启超在1902年就曾经提到过他。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一篇文章里说:“今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两大思想,一曰麦喀士之社会主义,一曰尼至埃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尼至埃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少数之优者为多数之劣者所牵制。”(《新民丛报》十八期《进化论革命者颌德之学说》)这是我国知识界第一次提及马克思(麦喀士),也是第一次提到尼采(尼至埃)。

1904年,王国维发表《叔本华与尼采》,说尼采“肆其叛逆而

惮者”；推崇他“以强烈之意见而辅以极伟大之智力，其高瞻远瞩于精神界”；认为他的工作在于“破坏旧文化而创造新文化”。

1907年，被称为中国尼采的鲁迅撰写《文化偏至论》介绍尼采对陈旧文化的挑战（“向旧有之文明，而加之掎击扫荡焉”），对近代文明的抨击（“见近世文明之伪与偏”）及其对未来生活之展望（“然其为将来新思想之朕兆，亦新生活之先驱”）。他赞赏尼采“张大个人之人格”，“尊个性而张精神”。鉴于当时中国“内密既发，四邻竞集而迫拶，情状自不能无所变迁。夫安弱守雌，笃于旧习，固无以争存于天下”，在这种积弱不振的处境下，尼采的自强哲学引起鲁迅很大的共鸣，而与其“改造国民性”的宏愿正相吻合。

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指出尼采将道德分成两类：主人道德是“有独立心而勇敢者”，奴隶道德是“谦逊而服从者”。据此而抨击儒家的“忠孝节义，奴隶之道德也”。尼采批评基督教道德为奴隶道德，这和陈独秀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之反封建孔教正相一致。

“五四”文化运动阐扬思想解放、反封建礼教，以及30年代作家提倡个性解放的浪漫主义风格，不无受尼采思想影响之处。其后，抗日战争爆发，这期间（1937—1945）整个中国陷入空前大浩劫的境地，解救民族的灾难，必须凝聚众智众力，共策共进，而尼采式的个人主义的观念与作风，遂为时潮所搁置。

五六十年代以后，我国大陆的知识界，由于受到苏联学风的影响，对尼采哲学经常出现与他原义相反的曲解。而这期间，尼采作品对西方文明之危机的反思，在文学与哲学领域里产生了巨

大的共鸣。研究西方现代哲学或当代哲学,不可能略去尼采,诚如普林斯顿大学考夫曼教授所说的:“在存在主义的演进过程中,尼采占着中心的席位:如果没有尼采,那么雅斯培、海德格和萨特是不可思议的。并且,加缪《薛西弗斯的神话》的结论,听来也像是尼采遥远的回音。加缪也曾经详细地写过尼采。在萨特的主要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中,尼采是第一个被提到的名字。雅斯培撰写过两大册有关他的书籍,且在其他的几本著作中,也详细讨论过;而海德格在他后期的作品中,比雅斯培更为重视尼采。”而存在主义只是尼采所产生的多面影响之一。在他死后的一世代中,“他的影响力及于德、法的整个文学界和思想界”(《存在主义》,陈鼓应、孟祥森、刘崎中译,商务版第一章)。从学术的立场,实有必要对尼采的思想进行探讨,而他对西方传统文化及近代文明的反省,对我们知识界也颇多可借鉴之处。

二

《悲剧哲学家尼采》出版于1962年,是我出版的第一本书。《尼采新论》则是由几篇论文组成,其中《尼采的挑战》和《尼采的价值转换》两文,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间先后草就于台湾大学教学期间;《尼采哲学的价值重估》、《尼采哲学与庄子哲学的比较研究》和《尼采和陈独秀的文化观比较》三文,则在1985年初至1989年完成于北京大学讲课期间;《尼采年谱》,于1986年秋冬间撰成,主要材料为依据海曼(Ronald Hayman)的新作《尼采评传》。

《悲剧哲学家尼采》和《尼采新论》中的后三篇论文,在空间

上,前后写作于台北与北京;在时间上,相隔竟有二十多年之久。这期间,大局的变动,反映在个人的心路历程上亦颇有一些转折。

在写作《悲剧哲学家尼采》小书时,个人在文化背景上,怀着单纯的“反传统主义”的心思,行文间不无借尼采来抒发一己感怀之处,在表达形式上,亦常充满激情的感性色彩。而二十多年后所写的几篇论文,则个人在学术进程上,侧重于探寻“反传统主义的传统”以及古典文化中多元并与多元发展的问题,因而写作论文时,在表达方式上,较之前作,加强了它的学术论点。虽然两本书在内容上有许多重复之处,这不仅是由于不同的写作时间,主要是由于我对其中某些观点的重视与偏爱,所以这些重复的地方就仍让它维持原样。

我接触尼采的作品是1960年在台湾大学做研究生的时候。大学时代,我为柏拉图的辩才所吸引,而惶惑于他的玄学的迷雾中,稍后,研读经验论学派著作,开始对形上学的论题感到不满。我的学士论文写的是《洛克的知识论》,但对西方哲学所讨论的内容,在心态上依然格格不入,直到进入研究所读到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才得知西方哲学另有新天地。最初,尼采的作品在我的感性生活上引起巨大的共鸣,那时我的心情经常沉入“少年维特之烦恼”中,在尼采作品中所感染到的浓郁的生命感,使我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气氛里超拔出来,其入世的热切态度,其遭遇阻难时的百折不挠精神,更是长期鼓舞着我。并且,尼采作品在我的智性生活上也有着很大的启发:由于研究尼采,使我对西方哲学之“注入过多神学的血液”,有较深的认识;由于研究尼采,使我研读基督教的《圣经》而发表《耶稣新画像》;由于研

究尼采,使我对存在主义发生兴趣,并由存在主义进入庄子的世界。在尼采与庄子思想的同异之间,使我对各自的传统文化有较多面的了解;由于他们,加深我对基督教“奴隶道德”与儒家“家禽道德”的认识;由于他们,使我对于生命中的悲剧情调及其艺术精神有较高的评价。

我从中学开始,在台湾就经历着 50 年代的“白色恐怖”:残余的权势集团在岛内展开地毯式的捕杀活动;在政风上,由一元化的布局中推展其一家一姓的造神运动;在文化上,独尊儒术——孔儒的忠君观念及其上下隶属关系的“奴性道德”,为官方刻意宣扬着,袁世凯的祭孔仪式在台北孔庙里重演着。另一方面,30 年代以来的文学作品几乎全在严禁之列,“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传统被拦腰切断,保守主义的空气达到令人窒息的地步。因而,尼采宣称“上帝之死”及其“一切价值转换”的呼声,深深地激荡着我的思绪。

1972 年夏天,我短期访美,正值岛内外保卫钓鱼台运动方兴未艾。留美的知识青年,目睹长期以来祖国同胞发挥众智众力而排除百年大患的帝国主义的干扰,这一事实在海外华人中产生了巨大的政治与文化的认同运动。在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冲击下,使我的思想起了不小的变化:我由一个美国生活方式的憧憬者而转向一个反帝的民族主义者;我由一个个体主义者而开始关注社群生活及国家民族的前途与方向。这年秋冬,台大校园举办了一连串的座谈会,我在会上的言论为国民党当局所猜忌,终于在“民族主义座谈会”中,我的发言引起了一场冲突性的争论,接着带来岛内知识青年间第一次公开性的统独之争,并导致

1973年“台大师生被捕案”，亦成为《大学杂志》遭致整肃以及“台大哲学系事件”之导火线（详情见纽约州立大学黄默教授著：《1971—1973年台湾知识分子政治改革运动》，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1976年英文版）。

1973—1979年间，在社会意识与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我用不同的笔名发表过数十篇文章。这时期我虽然颇受尼采“投入”精神的鼓舞，但已认识到尼采思想中自我意识之力孤、社群关心之薄弱、反帝概念之欠缺及其反女性主义之偏见。不过尼采的人本主义思想、对基督教价值观与近代商业文化庸俗化的批判，迄今仍为我所激赏。

三

1984年秋，我回到阔别35年的祖国大陆，初次在北京大学讲尼采与老庄哲学，并承北大哲学系汤一介教授之邀，在中国文化书院讲这东西两家的比较哲学。1986年秋，以《尼采哲学与庄子哲学的比较研究》为题，在北大开课。在一个安定的学术环境下，教学之间，获得不少的启发。适逢国内掀起一片“文化热”，知识界热烈地检讨传统文化对现代生活的作用，学界认真地研究西方学说，并开始广泛地介绍西方各种思潮，全国各地的学术讲座与研讨会，如雨后春笋，学术空气之活跃，为三十多年来所未有过的好光景。在这种空气的激励下，我也经常参与讨论，从尼采研究的心得里，对于传统文化价值的反省，有这样的一些概略的看法。

尼采是个举世著名的反传统主义者，但他对传统文化却非简